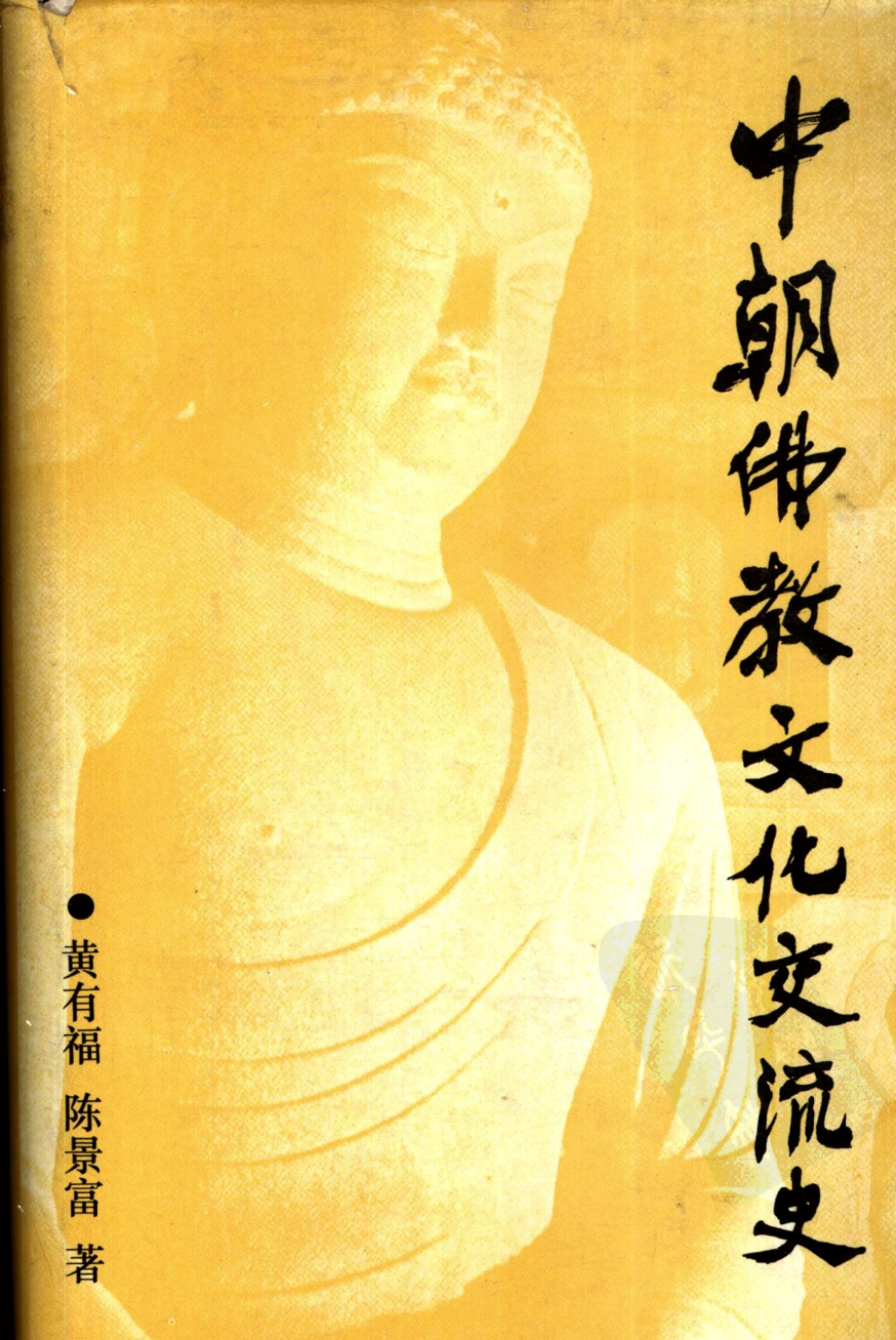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

● 黄有福 陈景富 著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

任繼愈署簽

黃有福 陳景富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黄有福,陈景富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ISBN 7-5004-1397-1

I.中…

II.①黄…②陈…

III.①佛教-文化交流-中国②佛教-文化交流-朝鲜

IV.B94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人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25插页:2

字数:396千字 印数:1—1200册

定价:24.50元

新
华
学
社
PDG

内 容 提 要

中国和朝鲜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源远流长，从未间断。本书作者从浩瀚的汉文、朝鲜文史籍中高度概括出中国佛教东渐朝鲜半岛及其发展的历史。侧重论述天台教、律学、华严学说、密教、唯识学说、禅法的传播；介绍朝鲜僧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以及两国佛教文化艺术的交流。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中国佛教东渐朝鲜半岛	23
第一节 中国佛教东渐的社会背景	23
第二节 高句丽佛教的肇始	28
第三节 百济佛教的初传	32
第四节 新罗佛教传入时间异说两种	33
第二章 六世纪初至十一世纪末朝僧入华 求法请益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39
第一节 入华求法请益活动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39
第二节 求法请益活动情况概述	44
第三节 求法请益活动的几个特点	47
第三章 朝鲜人华学僧的西域求法活动	56
第一节 早期的朝鲜西域求法僧	56
第二节 唐朝初叶的朝鲜西域求法僧	58
第三节 唐朝中叶的朝鲜西域求法僧	61
一、 慧超和他的《往五天竺国传》	61
二、 无漏、元表、悟真的西域求法活动	66
第四节 朝鲜入华学僧西域求法活动总结	76
第四章 中朝佛教典籍的流通	79
第一节 汉文佛教典籍的编目与入藏概况	79
第二节 汉文佛典在朝鲜半岛的流布	85

第三节 朝鲜佛教典籍回传中国	93
第五章 中国天台教观传入朝鲜	97
第一节 中国天台教发展概况	97
第二节 早期法华教观的东传	99
一、发正与《法华经》观音信仰	99
二、玄光传法华安乐行门	101
第三节 中国天台教观全面传入朝鲜	103
一、波若、缘光与智颚的关系	104
二、法融师徒与朝鲜止观学说的发展	106
第四节 义天传慈辩教观	109
第六章 中国佛教律学在朝鲜的传播	117
第一节 中国佛教律学发展概况	117
第二节 戒律传播海东三国的次第	123
第三节 圆光的世俗五戒与占察宝	126
第四节 慈藏定律	133
第七章 中国华严学说之流播朝鲜	141
第一节 慈藏与朝鲜华严学之滥觞	143
第二节 义湘师徒的求法与传教	149
第三节 澄观、净源华严学说的流传海东	161
附：杭州慧因寺事迹	167
第八章 中朝两国密教的关系	171
第一节 明朗、惠通等人对早期杂密的研习与传播	171
第二节 纯密在朝鲜的传播概况	176
第九章 唯识学说东传朝鲜	189
第一节 早期唯识学在朝鲜的传播	190
第二节 法相唯识宗在朝鲜的传播	194

一、圆测与中国唯识宗的西明学系·····	194
二、圆测以外的入华唯识学僧及其传法活动·····	207
第三节 高丽王朝时期唯识学的主流·····	216
第十章 中国禅法的东传朝鲜·····	219
第一节 入学僧对双峰禅与东山法门的研传·····	221
第二节 北宗渐悟法门与朝鲜的曦阳山派·····	226
第三节 南宗怀让系禅法在朝鲜的广泛传播·····	233
一、西堂智藏与迦智山、实相山、桐里山三派·····	233
二、麻谷宝彻与圣住山派·····	239
三、章敬怀晖与凤林山派·····	242
四、南泉普愿与师子山派·····	246
五、盐官齐安与闾岷山派·····	248
六、沩仰宗脉在朝鲜的传播·····	252
第四节 南宗青原行思系禅法在朝鲜的传播·····	259
一、云居道膺与海东“四无畏大士”·····	259
二、石霜庆诸的海东法裔·····	269
三、法眼宗在高丽的传播·····	274
四、投子大同与高丽璨幽·····	279
第五节 中国佛教禅宗传播海东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283
第十一章 朝鲜僧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	287
第一节 起沉继绝的三论大师僧朗·····	287
第二节 朝鲜僧人与中国的佛典翻译事业·····	290
第三节 无相禅师的法系及其禅法的演变·····	300
一、无相生平事迹及其法系·····	300
二、“三句用心”的内容及其演变·····	304
附一：无相禅师传法世系·····	308

附二：成都静众寺与大圣慈寺资料·····	308
第四节 中朝佛教的合璧——赤山新罗法华院的诵经仪 轨及其它·····	322
第五节 地藏与九华山的佛教信仰·····	327
一、新罗僧地藏事迹与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形成·····	327
二、九华山地藏菩萨信仰道场形成的社会背景·····	330
三、九华山地藏菩萨信仰道场形成的历史意义·····	337
第六节 谛观、义通与中国天台教的中兴·····	343
一、谛观传教事迹及其地位·····	343
二、宝云义通——天台宗第十六祖·····	351
第七节 朝鲜僧俗撰写的汉文佛教碑铭的历史价值·····	355
第八节 张宝皋与中朝、中日佛教交流·····	368
第十二章 元代至明初中朝佛教文化的交流·····	375
第一节 元至明初入华弘法之朝鲜僧人·····	376
第二节 文化交流的特点·····	389
第十三章 中朝佛教艺术的交流·····	390
第一节 中国佛教艺术的发育成长概况·····	390
第二节 中朝佛教艺术交流概况·····	405
一、建筑艺术交流·····	405
二、造像艺术交流·····	414
三、绘画美术交流·····	425
四、梵钟、梵呗与写经艺术交流·····	430
附录一 中朝佛教文化交流人物一览表·····	436
附录二 中朝历史纪年对照表·····	476

序

朝鲜位于亚洲东北部，是隔鸭绿江、图们江与我国相望的近邻。

朝鲜的领土包括整个朝鲜半岛及其沿海的三千多个岛屿，总面积为 221487 万平方公里。半岛东西宽 216 公里（合 549 朝鲜里），南北全长约 1000 公里（合 2544 朝鲜里），故向来有“三千里锦绣江山”之美称。朝鲜民族是这个半岛国家的唯一民族，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000 年前居住在朝鲜半岛并制作使用过栉纹陶器（新石器文化）的古亚细亚人和公元前 1000—前 700 年开始由亚洲大陆迁移而来的无纹陶器（青铜器文化）的主人涉貊人。全岛各处都有新石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址，历史文献中关于“熊”、“虎”图腾信仰的记载，都证明朝鲜社会曾有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历史。

半岛上最先出现的国家，在北部是古朝鲜，在南部是马韩、辰韩和卞韩。

《三国遗事》沿引中国历史文献《魏书》说：“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据说此事与中国古代的“唐尧”同时。关于王俭其人，朝鲜《古记》中有更详细的文字叙述。所谓昔有桓因（又称帝释）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

世”，桓因知之，于是下视三危太伯，认为可以弘益人间，遂授与桓雄天符印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今之妙香山）神坛树下，谓为神市，此即所谓桓雄天王。当时，此地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求于桓雄，愿化为人。天神于是遣灵艾一柱，蒜二十枚，对熊与虎说，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身。熊食而能忌，终得女身；虎食而不能忌，故不得人身。熊、虎无法婚配。熊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桓雄乃与之交欢。熊孕而生子，名为王俭。王俭建国，都于平壤城（后称王俭城，为西京），遂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忽山”或“方忽山”）。御国一千五百年后，值中国周武王即位，武王封殷商旧臣箕子于朝鲜，独立而不称臣。坛君王俭让避它处，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王俭建朝鲜或为不经之文，武王封箕子也不一定属实，但却至少说明朝鲜立国是很早的，中朝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

《三国志》引《魏略》说，箕子之后，时值周衰，燕国自尊为王，并企图东略，但为朝鲜侯遣使劝阻。朝鲜侯之后，子孙稍骄虐，燕国于是遣将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箕氏朝鲜从此开始衰弱下来。秦灭六国，修筑万里长城，东起碣石。这时箕氏朝鲜的国王名否，他既畏强秦袭击，表示服属，但又不肯朝会。否死，传位于其子准，时为公元前 220 年前后。迨秦末天下大乱，燕、齐、赵民众不堪战乱之苦，纷纷逃亡到朝鲜，准将其置之于西部。刘汉立国，以沮水与朝鲜为界。燕王卢绾反，亡入匈奴，燕人卫满化装成胡人渡沮水降准，收燕、齐、赵流民为朝鲜守边。卫满强大之后，攻灭准，夺取箕氏朝鲜政权，历史进入卫满朝鲜阶段。真番、临屯皆受其役属。

卫满政权传至其孙右渠，不再入覲汉室，也不准真番等国与

汉朝通使。汉武帝于是于元封二年（前109年）遣楼船将军杨朴、左将军荀彘从海、陆两路出兵攻右渠，灭卫氏朝鲜政权，于其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临屯、真番二郡，并入乐浪、玄菟两郡，玄菟郡治所复迁至句骊地。又据《汉书》载，是年，汉昭帝置二外府，将古朝鲜地平那（即真番）及玄菟郡为平州都督府，临屯、乐浪两郡地置东部都尉府。至建武六年（30年），省都尉官，于是放弃单单大岭以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

在卫满朝鲜政权建立前后，朝鲜半岛的南半部也存在“三韩”政权，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或作卞）韩。马韩位于西部，统属五十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万余户。其民以土著为主，也有箕氏朝鲜遗民。据《三国志》载，卫满攻夺箕政权，箕鬲遂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或谓率其余众数千人，攻马韩，破之，自立为王），建都于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后来，其裔虽灭绝，但后人犹有奉而祭祀者。东汉初，服属乐浪郡。汉灵帝末年，韩国强盛，郡县不能制。三国景初年间（237—239），魏明帝遣刘昕、鲜于嗣定带方、乐浪二郡，其后，带方郡太守弓遵、乐浪郡太守刘茂攻灭马韩。

辰韩在马韩之东，相传其祖先原为秦人，因避嬴秦苛政而逃亡至韩国，马韩因割其东界地与之居。其言语与马韩异，而类于秦。故辰韩又称“秦韩”。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主，世代相传，不得自立，以明辰韩人为流移之民。可见辰韩实为马韩所制。辰韩初统六国，后析为十二国，新罗即其一。据《三国史记》载，初，朝鲜遣民分居于山谷间为六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林长苏伐公于杨山麓萝井傍林间，剖卵得一婴，收而养之，及成人，六部人皆推尊之，共立为君，是为新罗始祖，姓朴，名赫居世，时为汉孝

宣帝五凤元年（前 57 年）。新罗强大，统一十二国，据有辰韩之地。因此，古今又以辰韩即新罗。真兴王在位时，领土进一步扩大，中部到达汉城一带，往北甚至到达今咸镜南道。

弁韩在辰韩之南，其南与倭接，亦有十二国，皆属辰韩，又与辰韩共役属于马韩。十二国之一即百济。中、朝两国历史文献都有关于百济始祖的记载。一般认为，百济世系与高句丽同出扶余，故以扶余为姓。初，朱蒙（或谓邹牟、东明）自北扶余逃难至卒本扶余，扶余王有三女而无子，见朱蒙，以第二女妻之，后生二子，长者名沸流，次者名温祚。朱蒙在北扶余时曾与礼氏生子孺留，后亦至卒本，并被立为太子，最后继承王位。沸流、温祚恐难容于太子，遂与十大臣及众百姓南行，温祚居于河（汉水）南慰礼城，沸流居于滨海之弥邹忽。温祚得地利，都邑鼎盛，人民安泰，沸流惭愧而死，其臣民皆归慰礼。温祚即百济始祖。或谓南迁时百姓乐从，故号百济；或谓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时当汉成帝鸿嘉三年（前 18 年）。百济强盛后，统一十二国，据有弁韩之地，传三十一王，历六百七十八年而亡。

新罗始祖赫居世立国第二十一年，高句丽政权也开始建立。史载高句丽族出扶余，相传扶余王解夫娄老而无子，祭山川求嗣，后至鯢渊，得一小儿，形似蛙，身金色，王以为天赐之嗣，乃收而养之。后有天帝子解慕漱者至解夫娄旧都建国。解夫娄死，金蛙继位，于太白山南优渤水得一女子，是为河伯之女柳花，因出游，被天帝子解慕漱诱至熊神山下鸭绿边室私通，而后弃之。父母因其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于是将柳花幽于室中，日照而生卵，屡弃皆显神异，后还其母，裹之置暖处，卵化为一男，七岁而善射，故名朱蒙。朱蒙不为金蛙七子所容，遂与乌伊、摩离、陟父等结友南行，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又称盐难水，即今之

浑江)上而居,是为纥升骨城,建国号高句丽。以高氏为姓。不久,移都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县城,在鸭绿江北岸)。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又在国内城稍北的丸都山上建丸都城,作为夏宫。两汉时,高句丽地跨马訾水(今之鸭绿江)中游南北,南与涉貊,东与沃沮,北与扶余接壤,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427)迁都平壤城,政治中心转至朝鲜半岛,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北境在今辽东南一千余里处,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扶余,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原半岛三韩以北地皆为其辖有,涉貊、沃沮皆属中之,而三韩中之马韩地已为百济所有,新罗据辰韩地不变。公元600年,新罗与唐朝联兵攻灭百济,又过八年,新、唐联军攻克平壤,高句丽传二十八王,历七百零五年而亡。朝鲜历史进入统一新罗时期。

统一新罗末期,朝鲜半岛再次陷入短期分裂局面:新罗衰而未亡,后百济、后高句丽起而分庭抗礼。此后,半岛上先后建立两个统一王朝,即高丽王朝(936—1392)和朝鲜王朝(1392—1894),事已极明,不待赘言。

二

基于中国和朝鲜在地理上的毗邻关系,自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

在政治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社会发展的前几个历史阶段上,它经济发达,国力强盛,走在世界的前列。历史告诉我们,在私有制社会里,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会满足既得的利益,而是力图不断地扩大他们的统治地盘,猎取更多的财富。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他们要加强对国内人民的榨取;另一方面,也必然要对邻近国家、民族进行扩张和侵略。这一点反映

在中朝关系史上，也同样是事实可证的。具如前述，中国的汉朝政府曾经将自己的统治势力伸展到朝鲜半岛上，隋、唐政府也先后多次对高句丽用兵，企图控制朝鲜历史的发展方向。两国历史文献都明确地记载着，半岛上自三国时代开始，几乎每一个王朝的国王都曾接受过当时中国封建朝廷的册封，使节往来，不绝于途。由册封与接受册封所建立起来的藩属关系，固然往往是出自各自统治阶级的需要，但由此一关系所奠定的相对和平环境则更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交流学习，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各自国家的社会进步。当然，以此种政治关系为前提的交往与交流与在平等的国家关系基础上的交往与交流无疑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对于反映主仆关系的“册封”制度更不应当认为是合理、合法的。

中朝两国在政治上的关系，还反映在行政区划和统治机构设置方面。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建立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郡县制。汉隋秦制，郡县设置不变。汉武帝在朝鲜半岛所设四郡，后来虽被迫撤销，但郡县制度却被朝鲜历代王朝所采用。公元505年，新罗最先实行州、郡、县制度。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在辖境内设九州、一一七郡、二九三县，州有都督，郡有太守，县有县令，这些都和唐代的设置相同，其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高丽太祖王建灭后三国的百济、新罗以后，沿前制设十数州、县，临死时定《训要十首》，其中第四款说：“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从而为高丽确定了政治方向。公元983年，全国划分成十二个牧。至995年，中央集权包括郡县在内的地方政权体系正式确立并臻于完善。当时，全国共设十个道，道内设府、郡、县。与此同时，改十二个牧为州，并设十二个军，诸如左神策军、右神策军、天德军等等。节

度使既是一方面军的军事首领，同时又负责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在中央，则设三省、六曹、七寺制，受最高统治者国王的驾驭。李氏朝鲜建立后，形势的变化促使国家统治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三司（三省之一）及六曹制仍保持不变，全国区域的划分只有量的变化，郡县制仍照行如旧。这些历史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行政管理经验，即中央集权制政治对朝鲜政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经济方面，值得强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贸易往来，二是生产技术的传播。

在三国鼎立时期，即相当于中国南北朝至隋末、唐初的四五十年间，中朝两国的经济贸易形式主要是通过朝贡和赏赐来进行。据《三国史记》载，新罗与中国的交往始于第十七王奈勿尼师今即位二十六年（381）。那时，新罗国内年荒民饥，于是遣卫头入苻秦，贡方物。至第十九王纳祗麻立干世（417—458），南朝梁使始至新罗，赐衣著香物。第二十三代法兴王即位十年（523），梁帝再度遣使与新罗入学僧觉得至。法兴王末年，新罗与北朝高齐、南朝陈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入贡与赏赐与日俱增，隋唐统一时期尤其成为定规。高句丽起自卒本扶余旧境，与当时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疆域犬牙交错，两国接触频繁。早在其政治中心移至朝鲜半岛之前，便与刘汉政权有使节的往来，大武神王十五年（32），高句丽遣使入汉朝贡；太祖大王五十七年（109）、七十二年（124）又两次遣使如汉朝贡。此后，高句丽与曹魏、东吴、石赵、前燕、车晋、前秦、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往来频繁。自长寿王十五年（427）移都平壤，政治中心转至半岛中部后，高句丽与南朝各国也建立了朝贡关系。隋、唐两代与高句丽的关系比较紧张，但除战争时期外，双方往来也不少，直至公元668年灭

亡时为止。百济至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二十七年(372)始通于晋,毗有王世继通于南朝刘宋,此后与齐、梁、陈也都有密切的关系和频繁的往来。对于中国北方王朝,由于百济“立国东极,豺狼隔路,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故迟至盖鹵王十八年(472)始遣使“投舫波阻,搜径玄津”,经由海路入魏朝贡。但由于北魏拒绝出兵攻打高句丽,百济与北魏的朝贡关系复绝,并从此专意与南朝各国交往。上述情况说明:(1)三国中,高句丽与中国的往来关系建立最早,百济次之,新罗最晚;(2)与南中国的交往,百济最早,新罗次之,高句丽最晚;(3)在隋唐统一中国以前,交往的重点,高句丽主要在中国北方,百济与新罗主要在中国南方;(4)高句丽与中国交往的路线,主要从陆路,有时也从海路;其它两国与中国的交往路线,由于北方高句丽遮断陆路交通,因此,百济主要从西海路到达中国,而新罗在六世纪占领汉江流域前,主要靠通过高句丽的障碍从陆路前往中国,或通过百济从海路到达中国,后来则主要通过海路到达中国。

统一新罗时期,中朝两国的经济贸易出现了新的形势,在传统的朝贡与赏赐交换关系之外,还出了纯粹的商业贸易。清海镇大使张宝皋(又作“高”)即拥有大批商船及雇员,在唐朝、朝鲜、日本三国间穿梭以船进行大宗贸易。当时,新罗与唐通使、贸易的主要航道有二:一由新罗汉江口的穴口镇、南阳湾的唐恩浦起航,横渡西海(即黄海)到达中国的山东半岛,然后从登州登陆;二是从灵岩郡附近出发,经黑山岛到达中国东海定海县(今上海附近)或者浙江的明州(今宁波)。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如果自明州或扬子江口进发之船,得西风及乾坤风,都能到达新罗境。

中朝两国交易的物品,在三国时期有所谓的方物和两国王室

宫廷中的奢侈品。仅据《三国史记》记载就有三国的果下马、明光铠、金甲、雕斧，唐朝的锦袍、彩帛、画屏等，数量不太多，种类也较简单。新罗统一时期，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交换的物品从种类到数量都大增起来。唐懿宗与景文王的赐、贡是最典型的交易。咸通六年（865），唐懿宗遣使册封新罗王，“赐王官诰一道、旌节一副、锦彩五百匹、衣二副、金银器七事，赐王妃锦彩五十匹、衣二副、银器二事，赐王太子锦彩四十匹、衣一副、银器一事，赐大宰相锦彩三十匹、衣一副、银器一事，赐大宰相锦彩二十匹、衣一副、银器一事”。咸通九年，景文王遣使朝唐，谢恩，贡马二匹、麸金一百两、银二百两、牛黄十五两、人参一百斤、大花鱼牙锦十匹、小花鱼牙锦十匹、朝霞锦二十匹、四十升白氍布四十匹、三十升绛衫缎四十匹、四尺五寸头发百五十两、三尺五寸头发三百两、金钗头、五色綦带并班胸各十条、鹰金钹子并纷镒红帟二十副、新样鹰钹子纷镒五色帟二十副、新样鹰银钹子纷镒五色帟三十副、鹞子银钹子纷镒红帟二十副、新样鹞子银钹子纷镒五色帟三十副、鹞子银钹子纷镒红帟二十副、新样鹞子银钹子纷镒五色帟三十副、金花鹰铃子二百颗、金镂鹰尾筒五十双、金花鹞子铃子二百颗、金镂鹞子尾筒五十双、银镂鹰尾筒五十双、击鹰绯纈皮一百双、击子绯纈皮一百双、瑟瑟钿金针筒三十具、金花银针筒三十具、针一千五百。由于两国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时新罗境内通用的金属货币既有本国的无文钱，也有唐朝的铜钱。在此一时期里，中朝两国在经济上的互通有无还有两件事，一是中国曾于廉公元 669 年派僧人前往新罗求取磁石；二是兴德王的遣唐使大廉于公元 828 年回国时曾携归茶种，并种于地理山（即智异山）。新罗于善德王世已经有茶，至此而兴盛起来。